

考古余枕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 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考古余枕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 编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考古余杭. 三国两晋南北朝 /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编.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508-1548-3

I. ①考… II. ①中… III. ①文物—考古—余杭市—三国时代②文物—考古—余杭市—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0313 号

考古余杭——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 编

出品人: 江 吟

主 编: 陆文宝

统 筹: 朱锦东

责任编辑: 郭超英

责任出版: 冯斌强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5 楼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1827

装帧设计: 杭州国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0.75

印 数: 1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8-1548-3

定 价: 268.00 元

编委会

主 任 冯玉宝

副主任 钟 山

主 编 陆文宝

副主编 吕 芹

编务组 陆文宝 吕 芹 张君国 吴彬森 胡海兵 娄晓春

校 对 陆文宝 吕 芹

序 言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博物馆”。这一主题的提出又对当今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博物馆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如何利用文物藏品做好展览,如何将展览从“创建可持续发展社会角度”进行探索和实践?是每一家博物馆努力的方向。

余杭博物馆作为我区唯一一家综合性博物馆,集中收藏了余杭境内出土文物,展示了余杭历史文化。自开馆始便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展示、宣传,在可持续发展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余杭博物馆整合馆藏文物资源,结合时代热点,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展览,考古余杭系列展即为其中之一。该展览从考古的角度,运用丰富的文物资源,诠释余杭历史。至今年,将推出该系列展的第四个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是余杭又一个考古成果丰收的时期,是余杭历史上又一个大开发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虽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但这并未影响余杭的发展。其隶属关系基本无变化,社会经济也因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行和众多北方移民的迁入得到快速发展。余杭也成为了当时主要的移民安置地之一。北方移民为余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尤其是北方士人的迁移,促进了余杭西部山区的开发。余杭先民与他们一起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与手工业。整个社会经济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根据目前考古资料分析,青瓷烧造业是余杭手工业中相对较发达的行业,窑场颇多、产量较大、技术先进。作为历史文化的又一载体——画像砖,是这一时期余杭考古成就的特色,多出土于临平周边地区,数量较多,纹饰丰富。它的出土可以窥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先民的精神风尚:他们思想丰富,佛道儒三教并行;他们追求时尚,酬答作歌,讲经教授,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

六代豪华虽已逝,历经千余年,仍有踪迹可寻。“考古余杭系列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集中展示了余杭境内出土的这一时期文物,它们凝结、蕴含和诉说着金粉般的“六代社会”。相信此次展览定会让余杭人民感受昔日的繁华和先民的勤劳。

是为序。

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冯玉宝

乙未年夏于临平

目 录

序 言

综述 /1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大事记 /8

余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墓葬、古窑址分布图 /12

第一单元 三国——偏南一隅 /14

第二单元 西晋——稳步发展 /24

第三单元 东晋——持续发展 /72

第四单元 南朝——生机勃勃 /106

第五单元 窑业——日新月异 /128

第六单元 画像砖——丰富多彩 /140

结 语 /146

附录一 余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物一览表 /147

附录二 浙江六朝基本器物的演变规律 /163

附录三 浙江三国两晋南北朝典型器物演变图表 /164



开放融合 多元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余杭

吕芹

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南端,凭借境内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丰富而具有深厚内涵的文化。自七千年前起,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刀耕火种、良渚文化时期的高度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火洗礼、秦汉时期的统一与休养生息,发展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进入了一个动乱且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余杭偏南一隅,远离战火,以博大、开放的胸怀,吸纳八方来客,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多元独特。

(一)

从公元 220 年曹丕篡汉称帝建立魏国始,至公元 589 年隋灭南朝陈后主,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共 369 年。这一时期,分分合合,战乱不断,南北方政权更迭频繁,长期对峙。期间,南方政权自公元 229 年孙权称帝建吴开始,先后经历了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政权更替频繁而割据一方。

在此背景下,余杭的县域范围及隶属关系均因政权的更替而发生着微弱的变化。三国孙吴建国前,孙氏进军江东后为固统治,拓地盘,实施析地置县,分乌程、余杭两县设永安县,县治为永安山麓。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孙权派兵平定余杭县民起事后,分余杭县置临水县,县治在高陆(今临安市高虹镇高乐)¹。孙吴建国后,其行政区划基本沿袭东汉的州、郡、县三级制。但为了加强行政管理、镇抚山越,孙吴政权根据山川形便、聚落发展等情况,重置辖区内郡县。吴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将余杭所在地吴郡与丹阳郡、会稽郡重新划分,置吴兴郡(治于乌程)、东安郡(治于富阳)。“今吴郡阳羨、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²余杭县属东安郡,钱唐县属吴郡。至吴黄武七年(公元 228 年),废东安郡,余杭、钱唐均属吴郡。宝鼎元年(公元 266 年),余杭县改属吴兴郡(今湖州),钱唐县仍属吴郡,均隶扬州。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孙吴为西晋所灭,吴国所有郡县析入西晋版图。“吴郡领县十一:盐官、钱唐……吴兴郡领县十:余杭、临安……”³余杭、钱唐两县仍属扬州。直至南朝陈后主被隋所灭,在长达三百余年间,余杭隶属关系基本无变化。只是其中钱唐县在南朝陈祯明元年(公元 587 年)十一月乙亥,“割钱塘县为郡”⁴,郡治钱唐县。

(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虽然经历了几次短暂的县域及隶属关系的变化,但自孙吴政权建立



始,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其中移民安置措施,对于地处边陲的余杭来说,影响最大。它直接影响了当时余杭社会聚落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人口大迁徙,可分为区域内强制性人口外迁、人口流动及北人南迁。⁵南方地区内部强制性人口外迁或人口流动,从三国吴开始,主要是针对山越人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山越人主要指的是居住在吴、会稽、丹阳山区的越人和汉人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分布地区主要吴郡、会稽郡、丹阳郡,三郡交界地区分布最为密集。⁶余杭地处吴郡和丹阳郡交界的西南山区,境内东部水网平原,西部崇山峻岭,具有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又地处各辖区边界,社会较安定。因此余杭自秦始,便是统治者安抚山越、安置外迁人口的重要地区之一。北人南迁共有两次大规模较大,即东汉末年至三国吴,西晋永嘉之乱后。这种人口的迁移和当时佛教的盛行、寺庙的广建促进了余杭社会聚落的扩大。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和出土文物情况分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聚落发展较为迅速,分布呈扩展趋势。三国时期余杭先民及外迁人口主要聚居区位于临平街道、余杭街道、瓶窑镇等一带,这与东汉兴建南湖改善了苕溪沿岸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推行,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至两晋南朝时期,余杭成为北方移民主要居住地之一。这些北方移民成分较为复杂,以难民为主,兼有部分世族。这些人的迁入加大了余杭人口密度,以及聚落向西部山区的扩张,使得余杭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县治之一。尤其是部分士人因慕余杭山水而迁入。如西晋时河内轵人郭文进入余杭大辟山隐居。句容的许迈“谓余杭悬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陈安世、茅季伟常所游处,玉石立精舍于悬雷,而往来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⁷这些士人进入余杭中泰、闲林、潘板、长乐、径山等山区,垦殖山泽,创建自己的园林居所,大大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开发。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大量文物得到印证。截止目前,西部山区出土文物数量大大增加,占同时期文物的比重较两汉时期的比重有所增加。在这些器物中,日用器又为大宗。这均反映了西部山区在这一时期的开发程度,可以说,两晋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余杭西部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开发。

此外,除中西部山区得到快速开发外,沿东苕河流域的良渚、瓶窑、余杭街道及围绕临平山、临平湖的临平街道、星桥街道等中东部水网平原地区仍是当时聚落密集区。尤其是良渚镇、瓶窑镇及周边地区广泛分布着青瓷窑址,如天福山西晋窑址、西馒头山两晋窑址、叶家山东晋窑址、大观山果园东晋窑址、庙桥头东晋窑址、七贤桥东晋窑址、长命石山下窑址以及石马斗窑址等,其中石马斗窑址出土了大量的日用瓷器,在其他窑址区也广泛散落着陶瓷残片。这些窑址虽未经发掘,但反证了这一地区人口和聚落的集中。在临平山、临平湖一带,是当时钱唐县重要的聚落区。关于临平山、临平湖的记载颇多,如三国吴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⁸《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记载,临平湖岸曾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后取蜀中桐材,刻成鱼形,再敲击便发出声音。在三国吴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十月,“钱唐临平湖水赤,桓玄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异瑞,俄而桓玄败。”⁹《钱唐记》载:“临平山,在县东。周四十五里,去邑五十里。”文献对临平山、临平湖的大量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这里在当时的知名度较高,也反证了此地应为当时钱唐县人口较为密集和较繁华的地区。近些年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围绕临平山及周边地区发现了许多两晋至南朝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数



量不少的较精美青瓷器。其中 2011 年发掘的小林横山东晋至南朝墓一处共有 112 座墓葬,由此可以窥见这一地区的人口密集度之高。

作为新开发区域的西部山区,其聚落发展与原聚落密集区不同,基层社会控制较为松弛,因此便出现了类似岑村这样的以“村”冠名的聚落形式。这种形式在东晋至南朝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并影响着之后各朝代对此地的管理。

综上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聚落多分布在山麓地带和水路交通沿线,范围不断扩大,从中东部地区逐渐向西部山区推进。中东部地区仍为聚落密集区,尤以良渚镇、瓶窑镇、余杭街道及临平街道为最。这里也应是当时余杭的经济文化中心区。

(三)

根据上述聚落的分布情况,透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此时余杭经济在乱中稳步发展,发展速度较快。农业上,土地不断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尤其是西部丘陵山区的土地开垦。这与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迁入不仅为余杭增加了大量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豪门世族的迁入,他们凭借厚实的基础,占山固泽,开辟庄园,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庄园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当时成为一大亮点。如居余杭舍亭山的王敬弘之孙王秀之曾任南齐辅国将军、吴兴太守,但因余杭县有“隐业所在,心愿为之。到郡修治旧山,移置辎重。”¹⁰。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土地开垦,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业作物新品种。东晋初期,隐居大辟山的郭文便带来了区种法和菽麦。这大大丰富了余杭粮食作物的品种,也使农业由原来的水稻区开始向稻麦区逐渐过渡。¹¹

农业的发展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水利的兴修。这一时期,余杭塘堤堰坝的修建较多,湖泊整治也较频繁。特别是迁入的豪门世族渐渐了了大量的堰坝,以便退林为耕,发展他们的庄园经济。中部塘堤修筑规模也比较大,且受益范围较山区广。其中东汉修建的南湖以及临平湖的整治,对于当地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湖在《水经注》卷四〇中有记载:“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它的修建解决了东苕溪的蓄水排洪问题,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存环境。发展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湖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临平湖作为当时东部地区主要的湖泊,其废兴直接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发展。这一时期对它的整治,在《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中有记载,天玺元年(公元 276 年)秋临平湖“自翰墨草秽壅塞,今更开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的畜牧业、手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畜牧业虽不是此时余杭经济的支柱之一,但从目前出土文物中可以略见其发展状况。在马、牛、羊、鸡、狗、猪六畜中,余杭目前出土了羊、鸡、狗、猪形器物,且数量不少,制作也精美。其中鸡、猪器物数量较羊、狗类器物多,说明鸡、猪饲养的普遍性,也可从鸡首壶的大量出土得到印证。它们应为人们提供肉食的所养。通过对这些器物形制的分析,可知其饲养方式,猪、狗一般为圈养,鸡的饲养方式应为日放夜关(笼子)式的。

工业作为当时余杭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尤以青瓷烧造业颇具特色,成为当时余杭的一大产业。此时的窑场增多,产品丰富,产量增加。这与人口的增多,瓷器需求量加大有着直



西晋青瓷猪圈



西晋青瓷狗圈

为堆贴而成。¹²

这一时期瓷器的生产从类型上看,较之前更为丰富,可分为日用瓷器,包括钵、碗、盘、洗、砚、双耳或四耳罐、盘口壶、鸡首壶、水盂、烛台、香薰、唾壶等;明器如堆塑罐、灶、鸡笼、猪圈、狗圈等。从釉色和纹饰分析,以青釉为主,兼有黑釉瓷器。釉色一般较光亮,玻质感较强。装饰技法多样,有戳印、刻划、雕刻、镂空、堆贴等。纹样从三国至南朝略呈由繁到简的变化过程,其中三国至西晋有弦纹、网格纹、水波纹、篦点纹、鸟纹、蟠螭、羽纹等,一般装饰于器物腹部、肩部等位置,双系多装饰叶脉纹、绞索纹或为铺首。东晋至南朝,瓷器纹饰减少,前期以点彩为主,后期以莲瓣纹常见。器型也较简朴实用,南朝尤甚。此外,以动物为造型的器物大量出现,如虎子、狮形烛插、蛙形水盂、熊形灯盏、蛙形尊等。这类器物集美观和实用于一身,逼真写实,形态各异。砚台、水盂出土数量较之前代也有所增加,这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尚有一定关系。数量上,目前已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有类型器物中瓷器占大宗,这足以说明当时制瓷业的发达,也说明当时人们生活中瓷质用品已大量取代了铜器、漆器等用品,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综合上述分析说明余杭应是当时吴兴郡主要的瓷器生产和输出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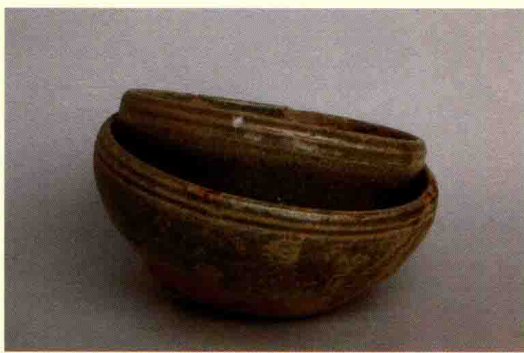
(四)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 369 年间,共经历了七次朝代变更。如此频繁的朝代更换中,余杭先民以坚强的毅力发展经济,同时以包容的胸怀,接纳、吸收外来文化,发扬本土文化,创造出了多元而又风雅的文化艺术。他们崇礼学,讲佛法,追求自然率真,艺术之花日趋绽放。

根据出土文物及历史文献记载,此时的余杭境内,佛、道、儒并行,其中佛教尤为盛行。其表现之



一是佛寺广建。东晋时扬州各郡中有3所以上佛寺的共有11个县,其中余杭、钱唐就在此列。¹³对于佛寺的兴建,许多文献均有记载。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建华严院于临平”¹⁴;大善寺,南宋嘉泰《吴兴志》卷十三记载“在县南二十七里唐栖村,梁大同二年水部员外郎沈著舍宅为寺,号永明。”南朝陈至德二年(公元584年)十一月,“临平镇沉为湖,御史胡敏请建佛寺,”¹⁵后按其请,在临平镇的西南建宝刹,选二百八十九人剃度为僧。这些佛寺的建造,一则



东晋青瓷碗

说明了在当时人们信仰中以佛教独大。另外,它的建造也带动了佛寺周边信众的集中,从而促进了该地区聚落的发展。表现之二是高僧众多。据《高僧传》记载,南朝宋时,余杭籍僧人有慧静、净度、僧瑜、僧翼。他们不仅潜心研究佛经,还宣扬佛法。曾隐居余杭山的支遁常向上层社会弘传佛教。并且“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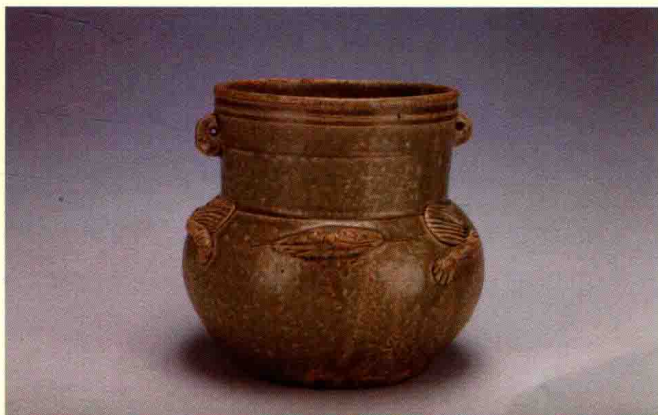
佛教的盛行还可以从出土文物中找到痕迹。在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存在着大量的佛教元素,如佛教护法者形象狮子图案或狮形器物、塑有寺庙楼宇和僧人形象的堆塑罐、刻划莲花纹的青瓷碗等等。

儒学与道教在这一时期也是余杭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作为朝廷正统,其盛行一般由政府推行。作为地方官的余杭县令这一时期也多兴学校,崇学敦教。县令范宁曾“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许多有志之士多效仿其行为,多年之后,“风化大行”。此时的道教在余杭也颇为盛行,特别是余杭秀丽的山区风景,吸引着大批士人前来建立道场,修身养性。因此道教场所开始增多,如许迈在余杭悬壑山建精舍,“以寻仙馆”;西汉建造的位于余杭县南大涤山的洞霄宫,“历代祈禳,悉在此处”(钱镠《天柱观记》)¹⁷。

佛、道、儒并行的现象,在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1987年余杭闲林埠出土了南朝画像砖,2011年小林横山六朝墓群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画像砖。这些画像砖的纹饰题材除文字外,可分为三种,一是佛教题材,一般选取某种佛教元素,如狮子、宝轮、宝珠、莲花灯等图案;二是道教题材,有四神、凤鸟、伎乐飞仙、仙人骑虎、仙鹤等。三是儒学题材,主要是伎乐、侍女、门吏等,它即可以窥见当时余杭社会的流行风尚,也可看出社会阶层等级得森严分明。



西晋青瓷狮形烛插



东晋青瓷蛙形尊



三国青瓷洗

儒学的另一体现便是当时的丧葬习俗。这可从墓葬的地址选择、等级排列、营建方式、葬品组合等方面分析。截止目前，余杭境内经过考古发掘的六朝墓地，比较集中的有临平山、闲林街道东北庙山、余杭街道义桥、七里亭、凤凰山村茶山、临平东湖街道茅山、小横山、星桥街道的里山、马家山等等。余杭为杭嘉湖向宁镇地区过渡区域，其墓地选择

一般分布在低矮山体的顶部或山坡，或者紧邻山体，也有部分位于平原地区。墓葬多坐北朝南，也有部分呈东西走向。反映了六朝时期的堪輿观和排葬规律¹⁸。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特征明显，均为砖室墓，平面可分为凸字形、长方形、椭圆形等。墓顶普遍呈拱券状，少量为穹窿顶，墓壁往往采用丁顺结构，并以三顺一丁和四顺一丁为主。墓葬普遍由墓门、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部分铺底砖下设有排水沟并一直通向墓外。其中等级较高的墓室建造比较考究，如马家山 M1，墓葬规模较大，墓壁为四翼渐进式，这在杭州地区较为少见，丰富了杭州地区各类墓葬的形制特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随葬品多为青瓷质地的日常生活用具为主，酒具、茶具、文房用具为辅，如盘口壶、碗、盘、钵、唾壶、鸡首壶、堆塑罐等，另有少量的明器，如堆塑罐、猪圈、狗圈、鸡笼、灶等。可以看出，当时在崇尚佛、道，注重生死轮回的丧葬观念支配下，人们盛行厚葬，重视逝后生活的现状。

余杭出土的大量器物不仅印证着上述内容，也是余杭先民艺术成就的最好体现。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出土器物的造型装饰和画像砖纹饰的绘制上。出土的大量青瓷器艺术精湛，釉色晶莹光亮，造型多样，部分采用动物形象，神态逼真。西晋晚期，少数器物以褐色点彩装饰，朴素中透着美。如2012年余杭街道马鞍山筑路工地出土三国青瓷洗，淡青色釉，光泽感强，其唇面环绕两周水波纹，内壁刻划波涛纹和篦纹，内底装饰展翅奔跑的大鸟，纹饰布局规矩而不显呆滞，反映了六朝早期逐渐摆脱了汉代“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礼法束缚，推崇自然率意的个性风采。1986年余杭石鸽出土的熊形灯座以站立的熊为整体造型，两耳竖立，双目圆睁，突吻呲牙，左上肢欲送食于嘴，栩栩如生。从造型上看此时的艺术成就，最典型的还是青瓷堆塑罐。一般为多层造型，形象丰富，罐上部一般塑有动物、人物、楼阁等造型，繁杂但不凌乱，物象逼真，刻画细致。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1985年临平东湖街道临平山西南出土的一件西晋青瓷堆塑罐，罐身上部的堆塑便体现庄园建筑和欢歌艳舞的景象。部分堆塑罐除了体现余杭先民的艺术成就之外，器身上堆塑大眼高鼻的胡人形象，说明当时余杭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较频繁。1984年6月余杭街道石鸽郭家村采集三国青瓷堆塑罐，罐体上部堆塑七个形态不同，服饰各异的西域男女艺人，或翩翩起舞；或拨弄琴弦；或双手作揖；或驯鹰套圈。形象生动，是余杭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的最好体现。

画像砖的纹饰绘制和技法工艺比较高超，有线雕与高浮雕两种；组合形式多样，单幅和多砖拼合



三国青瓷堆塑罐



西晋青瓷熊形灯盏

均有;纹饰线条舒缓流畅,图案又不失风雅之感;狮子画像威严中透着亲和;飞仙画像仙骨风流;武士、将军画像威严之感尽显;仕女画像轻盈淡雅……

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余杭这一时期的艺术素雅,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与当时人们狂放不羁,谈玄说理,崇尚佛道的社会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括而言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余杭因战乱而处在南北大交融的环境中,它博大的胸怀,融合、吸收外来元素,提升本

土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以后余杭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注释:

- 1.《浙江通史》第3卷《秦汉六朝卷》,P197,金普森、陈剩勇主编,王志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八。
- 3.《晋书》卷一五《地理下》。
- 4.唐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本纪》。
- 5.《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金普森、陈剩男主编,王志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247页。
- 6.《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金普森、陈剩男主编,王志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249页。
- 7.《晋书》卷八〇。
- 8.《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裴注引《吴录》。
- 9.《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
- 10.《南齐书》卷四六。
- 11.《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金普森、陈剩男主编,王志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389页。
- 12.《余杭石马埭东晋窑址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26辑。
- 13.《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金普森、陈剩男主编,王志邦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489页。
- 14.清沈潜《临平记》卷之一《事记》。
- 15.清沈潜《临平记》卷之一《事记》。
- 16.《高僧传》卷第四。
- 17.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七。
- 18.胡继根《浙江汉六朝墓葬发掘回顾》,《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5月,P7。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余杭大事记

时代	纪年	大事	资料来源
三国·吴	黄武元年(222年)	迁琮绥南将军,进封钱唐侯。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
	黄武间(222年~229年)	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以鲂为钱唐侯相,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	《三国志》卷
	赤乌十二年(249年)	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裴注引《吴录》,《宋书》卷二十九《符瑞下》
	永安元年(258年)	十月己丑,封孙皓为乌程侯,皓弟德钱唐侯。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
	宝鼎元年(266年)	于乌程分置吴兴郡。 吴兴郡,吴置,统县十:余杭……	《宋书·礼三》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
	天玺元年(276年)	秋七月,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宋书》卷二十七《符瑞上》
晋	太康元年(280年)	吴郡领县十一:盐官、钱唐……吴兴郡领县十:余杭、临安……	《晋书》卷一五《地理下》
	太康间(280年~289年)	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按:《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四:桐扣山,在仁和临平山之西,晋武帝时,岸坏,出石鼓,击之无声,张华取蜀桐木刻作鱼形而扣之,声闻数里故名。)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建武元年(317年)	周绎侯庙,在临平镇,晋建武元年侯裔孙卓卜居临平,乡之大姓俞氏因即其地祠侯。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
	咸和三年(328年)	(庾)冰、(顾)颉等并退于钱唐……贼管商乘船旁出,袭(虞)潭及(顾)众。潭等奔败。潭还保吴兴,众退守钱唐……或劝舒宜还都,使谢藻守西陵,扶海立栅。舒不听,留藻守钱唐……贼复掠东迁、钱塘、武康诸县。	《晋书》卷七十六《王舒传》



时代	纪年	大事	资料来源
晋	咸和三年(328 年)	(管) 商等又焚余杭, 而大败于武康, 退还义兴。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临平人范明亦谓众曰: 此地险要, 可以制寇, 不可委也。众乃版明为参军。明率宗党五百人, 合诸军, 凡四千人, 复进讨健。健退于曲阿。	《晋书》卷七十六《顾众传》
	四年(329 年)	苏峻反, 允之讨贼有功, 封番禺县侯, 邑千六百户, 除建武将军、钱唐令, 领司盐都尉。临平人范明率宗党合义军 500 余人与峻部战。	《晋书》卷七十六《王允之传》、《余杭县志》(1990 年版)《大事记》
	隆和元年(362 年)	东海王奕求海盐、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直, 帝初从之, 严谏乃止。	《晋书》卷七十八《孔严传》
	宁康元年(373 年)	(范宁) 为余杭令, 在县兴学校, 养生徒, 洁己修礼, 志行之士莫不宗之, 期年之后, 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 崇学敦教, 未有如宁者也, 在职六年。	《晋书》卷七十五《范宁传》
	元兴二年(403 年)	十月, 钱唐临平湖水赤, 桓玄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异瑞, 俄而桓玄败。(按:《水经注·渐江水》引《钱唐记》: 桓玄之难, 湖水色赤如丹。《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五》: 楚王玄上表请归藩, 使帝作手诏固留之, 又诈言钱塘临平湖开, 江州甘露降, 使百寮集贺, 用为己受命之符。)	《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
南朝·宋	义熙十二年(416 年)	建华严院于临平。	清沈谦《临平记》卷之一《事记》
	景平二年(424 年)	伪宁朔将军孙伦领五百人攻钱唐, 与县戍军建武将军战于琦。	《宋书》卷五十二《褚淡之传》
	元嘉十二年(435 年)	东诸郡大水, 民人饥谨, 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唐升米三百。	《宋书》卷六十三《沈演之传》
	元嘉十三年(436 年)	是年, 东土饥, 朝廷派遣扬州治中从事沈演之巡行。沈演之上表曰: 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 恪勤匪懈, 百姓称咏, 诉讼希简, 又翦荡凶非, 屡能擒获。灾水之初, 余杭高堤崩溃, 洪流迅激, 势不可量, 道锡躬先吏民, 亲执板筑, 塘既还立, 县邑获全。 演之表真道及余杭令刘道锡有美政, 宋文帝嘉之, 各赐谷千斛, 以真道为步兵校尉。	《宋书》卷四十九《刘怀肃传》



时代	纪年	大事	资料来源
南朝·宋	元嘉中(424年~453年)	谣言钱唐当出天子,乃于钱唐置戍军以防之。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上》
	泰始二年(466年)	会稽太守孔觊、吴郡太守顾琛据郡同反,太宗遣巴陵王休若董统东讨诸军,建武将军吴喜属焉。二月九日,喜等至钱唐,钱唐令顾昱及孔觊、王昙生等奔渡江东。	南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九 《宋书》卷八十四《孔觊传》
南朝·齐	永明三年(485年)	冬,(唐)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与分布近县。余杭令乐琰战败,乃奔。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四《列传第二十五》
	永明四年(486年)	正月,富阳人唐寓之反,聚众桐庐,破富阳、钱塘等县。	《南齐书》卷三《本纪第三》
		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成为伪富,以钱塘县为伪太子宫,置百官,称吴国,伪年号兴平。	唐李延寿《南史·茹法亮传》
		台军至钱唐,之众乌合,畏骑兵,一战而溃,擒斩寓之。	《资治通鉴·齐纪》
	永明七年(489年)	吴郡太守江敦于钱塘县获苍玉璧一枚以献。	《南齐书》卷十八《志·祥瑞》
	永明间(483年~493年)	籍字文海,仕齐为余杭令,政化如神;善于摘伏,自下莫能欺也。又为钱塘县。下车布政,咸谓数十年来未之有也。	《南史》卷二十《列传第十一》
南朝·梁	大同二年(536年)	大善寺,在县南二十七里唐栖村,梁大同二年水部员外郎沈著舍宅为寺,号永明。	南宋嘉泰《吴兴志》卷十三
	太清三年(549年)	五月,景遣仪同宋子仙等率众东次钱唐,新城戍戴僧逖据县拒之。	《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
		七月,陆缉等竟为暴掠,吴人不附,宋子仙自钱塘旋军击之。	《资治通鉴·梁纪》
		十一月,宋子仙攻钱塘,戴僧逖降景,以钱塘为临江郡。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置吴州于吴郡,杭地属之。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一引万历《县志》
	大宝元年(550年)	五月丙辰,侯景以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钱唐。	《资治通鉴·梁纪十九》
		十一月,(张)彪自围钱塘,与赵伯超战,败于临平,死者八万余人。	《资治通鉴·考异》卷七



时代	纪年	大事	资料来源
南朝·梁	大宝二年(551年)	正月辛亥,张彪遣其将赵棱围钱塘,孙凤围富春,侯景遗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救之,棱、凤败走。	《资治通鉴·梁纪二十》
		十一月戊寅,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镇钱塘。	《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
		景至晋陵,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进次嘉兴,赵伯超据钱塘,拒之,景退还吴郡。	
南朝·陈	至德二年(584年)	十一月,临平镇沉为湖,御史胡敏请建佛寺,从之。	清沈谦《临平记》卷之一《事记》
		后主从其请,遂明召选,得二百八十九人,钦度为尼,仍敕冬官,于镇之西南崇建宝刹。	清《临平记》卷之一《事记》引胡通《明因寺碑记》
	祯明元年(587年)	十一月乙亥,割扬州吴郡置吴州,割钱塘县为郡,属焉。	唐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本纪》
		置钱塘郡,有县二,曰富阳、新城。	清康熙《杭州府志》卷一
	祯明二年(588年)	正月辛巳,立皇子恮为东阳王,恮为钱塘王。	《陈书》卷六《后主本纪》

(摘自《余杭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1 月)